

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

抗战时期胡风的『主观论』研究

黄晓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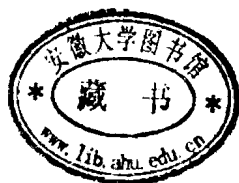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央编译局出版基金项目 | 基础理论系列 |

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

抗战时期胡风的『主观论』研究

黄晓武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抗战时期胡风的“主观论”研究/黄晓武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17-1560-9

I. ①马…

II. ①黄…

III. ①胡风(1902~1985)-文艺思想-文学评论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366号

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抗战时期胡风的“主观论”研究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 洁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187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主观论”及其批评史	4
第一节 黄药眠的立场	7
第二节 香港批判	12
第三节 从革命的反派到反革命	15
第四节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	20
第二章 “主观论”问题的缘起	29
第一节 《七月》与《希望》的差别	29
第二节 “民族文学”	32
第三节 儒学的复兴	36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39
第三章 郭沫若与左翼阵营的儒墨之争	42
第一节 屈原的思想	43
第二节 儒墨批判	53
第三节 反对教条主义	65

第四章	“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	68
第一节	“生活三度”说	68
第二节	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	75
第三节	唯“唯物的思想”论	83
第四节	批评与反思	88
第五章	“主观论”及其对象	96
第一节	感性的对象	96
第二节	“在混乱里面”	108
第三节	个性解放	123
第六章	“主观论”与“香港批判”	134
第一节	文艺的新方向	134
第二节	论主观问题	143
第三节	论小资产阶级的改造	152
第四节	文艺的感性作用	160
第七章	结论	171
参考文献		184
后 记		195

前 言

胡风的“主观论”在胡风研究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体现了胡风文艺思想的特殊性，也是界定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依据。在不同时期，胡风对创作中作家主观作用的强调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本书关注的是20世纪40年代“主观论”问题的提出，试图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梳理，从新的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并发掘这一问题中包含的复杂的历史关系。

20世纪40年代胡风等人的“主观论”的提出是为了反对左翼阵营中的机械主义与教条主义，在文艺上的直接对立面是姚雪垠、沙汀、茅盾等的文学创作，而在思想和学术上，另一个对立面则是郭沫若的儒墨研究，后者在现有的胡风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就无法全面地认识“主观论”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的某种限度。郭沫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儒学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

胡风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提倡和“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有很大关系，双方在最初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论争中站在一起，但在1948年的香港批判中，“才子集团”却成了批判胡风“主观论”的主要力量。现有的胡风研究在涉及“生活态度论”时，往往局限于执守与背叛这样一个框架，没有对“生活态度论”和“香港批判”本身的观点和动力作更多的研

究，而缺乏这种视角，我们就不能理解“才子集团”从“生活态度论”到“香港批判”的转变，也不能理解相对而言胡风的执守究竟意味着什么。本书认为，在香港批判中，“才子集团”认识到知识分子受教育的最好途径是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单纯地诉诸抽象的主观能动性，认为知识分子对主观能动性的提倡仍停留在马克思所说的费尔巴哈阶段，因而才会对“主观论”提出批判。

本书从历史框架出发，对这些论述进行了梳理和辨析，认为不管是胡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还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利用和阐发，都与民族主义等思潮诉诸人们的情感，用“民族的”标准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标准的挤压有关，是左翼知识分子自觉的理论努力，试图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主体性、情感性的一面，是国统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努力的组成部分。论争各方都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同理论资源，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要通过人的主观因素起作用的，以对抗当时直接诉诸人的主体性和感性层面的“新儒学”、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认为后者是观念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成为其参考的主要理论资源，然而这些讨论本身能否脱离它们所批判的观念论的倾向，能否克服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教条主义的倾向，这在后来的研究中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没有这样一个背景，单纯从胡风文艺思想本身出发，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感性对象”等概念在这一时期胡风思想中的出现，也无法对胡风文艺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传统中的地位作出合理评价。

以往的胡风研究总是把“主观论”放在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立的这一框架中来加以论述。如果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观论”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非现实主义的而加以批判，那么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基本上是把它们归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甚至视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胡风与延安之间的对立或统一关系似乎一直是国内胡风研究的一般范式，而国外的研究也没有脱离这一范式，很多研究把胡风的“主观论”放在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位置上来讲，或者在二者的对立或统一关系上作出了更多样化的理解。但本书认为，胡

风与延安之间的对立或统一被当成研究的重点，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胡风文艺思想成为“政治问题”的根源。同时，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在新的条件下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途径。但这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胡风受到批判的那些思想的提出，开始的时候针对的并不是延安，它针对的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思想状况，因而必须被放置到当时国统区更广大的各种思潮论争的背景下来加以理解。

本书认为，胡风等人的“主观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框架内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是立足于中国左翼文艺传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毛泽东 1938 年以来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不完全一致，这也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走向“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支流的，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如果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走向毛泽东思想，没有看到这一发展过程本身的复杂性，这种简单化的思路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贬低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第一章 导论：“主观论”及其批评史

在建国后的“胡风问题”中，“主观论”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胡风对人的“主观”作用的强调，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辩证唯物的还是主观唯心的，这是界定胡风文艺思想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胡风自己、他的批评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中间，这都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不同时期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中，这一问题不断地被提及。对胡风的“主观论”的探讨一般是以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文章为基础的^①，这些文章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当时，这些文章中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所用的那些概念也不是他们自己发明创造的，可以说，它们跟当时的思想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回应关系。但是“主观论”后来被孤立和整合起来作为一个理论整体，成为批判和反批判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具有的某些历史联系被突出和强调了，某些历史联系却在我们的视野里渐渐隐去了，当然，这些突出和隐去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去研究的课题。没有人能够再现历史的全部，谁也无法整个地了解 and 再现一个事件包含的所有关系，但

^① 代表性的文章有《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为人民的斗争里面》等，和这些文章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舒芜的《论主观》等文章。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载《抗战文艺》1944年第9卷第3、4期合刊，胡风：《置身在为人民的斗争里面》，载《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舒芜：《论主观》，载《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

是，以某些正在隐去的文本和关系为中介，我们也许能接近历史的另一些方面，为已有的研究作补充。正像胡风若干年后在《胡风评论集·后记》中所说的：“人的言行总是受着具体历史环境（时间、地点、人事关系）的限制，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得到根据，又是针对着具体环境中的人或事表示他的感应、态度 and 理解的。因此，说明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于读者的检阅应该是有益的。”^①

胡风对“主体性”或创作活动中作家主观作用的论述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鲁贞银认为，1935 年至 1936 年间，胡风在《张天翼论》、《〈七年忌〉》、《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M. 高尔基断片》、《文学与生活》等文章和著作中就已经注意到了“主观”以及“主观力”这些概念，认为它们是胡风的文艺理论独到的起点。^② 艾晓明的研究甚至指出，“主体”的概念在胡风的著译中最早出现是在 1934 年的一篇译文《历史上主观条件之意义》中，并认为这篇文章中的思想对胡风有着指导性的作用。^③ 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主观论”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胡风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因为正是这些文章使胡风的主观论思想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和批判，而胡风的辩解也是从这些文章出发的。

在 1944 年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会的名义撰写并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及后来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文章中，胡风从抗战形势的发展出发，总结了文艺工作的成果，认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抗战期间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但也出现了各种病态的倾向，胡风把这些病态的产生归因于战争状态的日常生活所导致的文艺家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胡风认为，问题的解决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提高文艺家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另一方面也要争取客观的条件。“所以，在这个混乱期，就文艺家自己说，要克服人格力量或

① 胡风·《胡风评论集·后记》，见《胡风全集》第 3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83 页。

② 鲁贞银·《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0 年，第 79 页；也参见鲁贞银《鲁迅的“王见”与胡风的“王观战斗精神”》，载《浙江学刊》2003 年第 2 期。

③ 艾晓明《胡风与卢卡奇》，载《文学评论》1988 年第 5 期。

战斗要求的脆弱或衰败，就社会说，要抵抗对于文艺家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蔑视或摧残。”^①然而，在胡风看来，在这两个因素中，文艺家的主观努力是决定性的，因为“客观条件的争取依然是一种主观努力”^②，因此要提倡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克服当时文艺上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弊病的方法就是强调作家对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这一方面要求作家主观力量的坚强，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对象的深入。“感性的对象”是胡风在这一时期使用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此后在他的各种文章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胡风自20世纪30年代的《张天翼论》等文章以来就一直在强调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创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征服、相互融合，但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使用“感性对象”、“感性存在”、“感性机能”这些概念，并用这些新的概念来重新表述他原来的理论主张。应该说，胡风主要是从文艺家的主体方面对抗战以来的文艺提出要求的。

舒芜的主观论和胡风的有所区别，胡风强调的主要是创作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他试图解决的也是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而舒芜的《论主观》则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出发，来为思想领域提倡和强调主观性寻找理论依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约瑟夫（斯大林）阶段”，而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主观作用的加强。“所谓约瑟夫阶段，反映着历史新形势而作为其特质的，就正是对于主观作用的强调：换言之，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地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③他用“主观”范畴梳理了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这是他后来颇为人诟病的地方。舒芜在这篇文章中的很多观点，比如“主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教条主义是在主观上完成了的”等并不是他的独创，它们和当时重庆思想界的各种思潮论争，比如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等，有着密切关系，并有着一定的现实针对性。胡风和舒芜这些理论主张背后的历史契机和理论动力是很具

① 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载《抗战文艺》1944年第9卷第3、4期合刊。

② 同上。

③ 舒芜《论主观》，载《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

体的，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论争。

胡风和舒芜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之后都引起了批评者和研究者的许多争论，对它们的批评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黄药眠撰文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和《论主观》进行了批评；其次是1948—1949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展开的对“主观论”的批判；再次是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展开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它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对“胡风集团”进行批判的基调，此后30多年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的；最后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1988年胡风文艺思想彻底平反之后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在新的框架中重新看待“主观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这些研究今天还在继续和深入发展。^①

我们可以看到，胡风和舒芜的主观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提出的，而各个时期对主观论的批判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这并不是说这些争论的本质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可以有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它们各自参照的马克思主义框架本身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同的资源部分。而且，借鉴马克思主义资源当然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这些讨论并不是抽象的学院式的探讨，它们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左翼知识分子试图解答现实问题的理论努力。只有联系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理论论争背后的历史和现实的驱动力，才能理解主观论一次又一次地被拿出来清算背后的具体的历史差异性，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之前和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所作出的其他种种努力。

第一节 黄药眠的立场

黄药眠是最早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写文章对胡风和舒芜的主观论提出批评的学者，他认为胡风和舒芜的主观论只是披上了“约瑟夫的外

^① 关于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参见本章第四节《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中的论述，见本书第20—28页。

套”，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下掩藏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在写于桂林撤退前夜的《读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一文中，黄药眠对胡风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胡风把主观和客观截然分开，忽视了“主观精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犯了机械论的错误。“抗战这一个客观形势的存在，它基本上是由于主观的努力。作为知识者的作家，对于这，也曾担任过重要的角色。因此作家的主观和客观的现实有着内在的关联，决不是如执笔者所说的那样，主观和客观绝对机械地对立着。这是机械论的变种。”^① 在黄药眠看来，他和胡风的分歧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后者“没有正确的文艺社会观和正确的文学史的方法”。^② 他认为，胡风的这篇文章尽管使用了社会史观的框架，但“其中有机械派、波打诺夫布恰林派的观点，有唯心论马哈主义的观点，有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的观点，错综杂陈”^③，是“个人主义的文艺批评家的看法”^④。黄药眠认为，胡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上的错误理解导致了他不能正确认识抗战时期的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也不能正确提出解决文艺问题的方法。

在写于成都的《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中，黄药眠继续探讨了唯物史观中的主客观问题。他认为，舒芜尽管在文章中从卡尔（马克思）、伊里奇（列宁）到约瑟夫（斯大林）的理论发展出发来论述主客观问题，认为“真正卡尔—约瑟夫的看法，应正确地强调主观作用”^⑤，但在具体分析中，却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完全抛弃，把人类的整个历史解释成了主观的发展史，“舒先生把卡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学说完全抽出去，而代替以他自己的主观发展的学说”，“把整个历史的发展都看成为生命力的发展，或更确切地说，看成为主观的发展”。^⑥ 黄药眠认为，“卡尔—约

① 黄药眠：《读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见《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1948年版，第123页。

② 同上，第129页。

③ 同上，第128页。

④ 同上，第122页。

⑤ 舒芜：《论主观》，载《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

⑥ 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1948年版，第13页。

瑟夫强调主观作用是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根据当时的历史的任务，强调特定阶级对于推动历史的主观作用”^①，但舒芜所说的“主观”却是一种抽象，抽去了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生活的内容。因此，舒芜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客观主义和“机械—教条主义”的批判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在唯物论的“外套”下掩藏了唯心论的各种杂质。“本来舒先生要相信唯心论、生机主义、唯生史观，这是舒先生的自由，但是舒先生硬要在唯心论上面借点机械唯物论来装点门面，便趁此机会披上了约瑟夫的外套，而自诩于唯物论之列则大可不必！对于这种伪装，我认为，每一个忠诚的唯物论者都有揭发他的义务。”^②

那么，黄药眠是反对胡风和舒芜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吗？为什么黄药眠说抗战这一个客观形势的存在基本上是由于主观的努力呢？这句话涉及黄药眠对主观问题的特定理解。唯物主义者是什么样的条件下讲人的主观能动性呢？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黄药眠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人的主观是由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主观力量反作用于社会物质条件。但他同时也认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主观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评论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时，黄药眠就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没落的阶级的腐烂日益暴露，新兴阶级从自然生长而逐渐走到意识的成长的时候——当这个时期，这新兴阶级的主观力，就不仅是推动客观的因素之一，而且是成为了变革这个世界的决定的因素。”^③他认为冯雪峰在主客观问题上忽视了主观战斗力，“没有把主观的力量看成为决定的因素，而只是在那里空谈客观的现实”，因此觉得冯雪峰对于“革命的史的唯物论”的最重要的命题，即人民的战斗力在一定的客观形势下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的因素这一点，完全是忽视了。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黄药眠强调主观战斗力，认为革命的宿命论者和客观主义者的错误，在于

① 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1948年版，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5—16页。

③ 黄药眠《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和客观》，见《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1948年版，第100页。

看轻了主观战斗力的决定作用。对于当时的作家的创作，黄药眠提出的要求也是：“作为一个近代作家，必须有自己坚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必须充满着战斗精神和蓬勃的活力，必须有为服务的耐心，因为必须这样，他才会有足够的精力和毅力，弹性和耐性，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去探测那些潜伏在生活的表面下的各种各样的灵魂。”^①

因此，尽管对胡风和舒芜的文章提出了批评，黄药眠却是赞同和提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也就是说，他们认识到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在表述和解决这个问题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和分析框架。黄药眠认为胡风和舒芜在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方面犯了错误，掺杂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而他所从事的则是理论甄别工作。他们都在唯物论的框架内谈人的主观能动性，都认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强调主观战斗力，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舒芜为什么会认为“主观是一种物质作用”，“教条主义是在主观上完成了的”呢？黄药眠对这些观点的分析和批判并没有触及其具体的理论来源，忽视了胡风和舒芜的观点提出的具体的语境，没有分析“主观论”和之前的“生活态度论”以及重庆其他思想论争之间的关系，只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展开了对基本概念的辨析。这可能跟黄药眠当时不在重庆、不太了解重庆思想界的状况有关，他是在重庆左翼论争的范围之外来评价胡风和舒芜的主观论的，所以在探讨主观论的根源时，他有时甚至把它归之于主观的英雄主义、风头主义：“不错，他们的热情是有的，然而他们的热情，有时并不是来自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上，（虽然他们口头上还是说为国为民），而是来自主观的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或是某种自私的目的上。”^② 这样的说法当然会引起胡风等主观论者的愤怒。

在写于“香港批判”时期的文章中，黄药眠重新评价了胡风等人的“主观论”，虽然他还是认为后者是个人主义的走私主义的哲学，也就是

① 黄药眠《思想和创作》，见《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1948年版，第79页。

② 黄药眠《文艺之政治性、艺术性及其他》，见《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1948年版，第87页。

说，“在外表上，他们用的也是马列主义的牌子，然而实际上则在偷运着个人主义的私货”^①，但是他也试图重新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主观论，认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是个人主义吧，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某一特定的地方，它也许可能还起着若干的进步作用”。^②“在过去革命的低潮时期，或者说是在南中国的统治时期，封建势力独裁势力占着统治地位，在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作家，以他的个人主义和封建势力对抗，毫无疑义这是有进步的意义的。”^③

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风“主观论”的错误又体现在哪里呢？黄药眠认为，胡风等人的错误在于在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开始这样一个转型期，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任务的变化，仍然坚持前一时期的观点。“历史是有阶段性的，在前一个阶段，这种现象也许是一种微小的缺点，或是可以容忍的错误，但在新的一个阶段里，这种现象已经是不可容忍的，原则性的错误了。”^④因此，余林（路翎）在《论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中为主观战斗精神的辩护，在黄药眠看来，就犯了时代错误。“如果余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政协协议未被撕毁之时，这些话，也许在某些蒋管区有其若干的意义，因为那时的一般的策略是要争取公开，争取和平，以上层的活动来掩护下层，可是到了政协决议已被撕毁，新的策略是在于发动广大的农民实行土地改革从事于武装斗争的时候，这些话显然就是昧于国家大势的谬论了。”^⑤

我们可以看到，黄药眠虽然似乎从抗战中起就一直坚持对胡风等人的“主观论”提出批评，但他的批评背后的框架是出现了转换的，而这种转换是跟大的历史时代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1948年香港批判的意义所在。

① 黄药眠·《论走私主义的哲学》，求才出版社1949年版，第6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黄药眠·《论诗歌工作上的几个问题》，见《论走私主义的哲学》，求才出版社1949年版，第51页。

④ 同上，第50页。

⑤ 黄药眠·《论走私主义的哲学》，求才出版社1949年版，第11页。

第二节 香港批判

1948年3月至1949年3月，邵荃麟、胡绳、乔冠华等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共六辑）^①，配合着解放战争中共共产党转入全面反攻的新形势，对国统区的文艺状况进行了全面检讨，其中包括对胡风的“主观论”进行了批评，在胡风研究中，这次集中的批评被称作“香港批判”。^②但“香港批判”并不是一场针对胡风等个别人和个别文艺思潮的批判，而是在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后，对国统区整个文艺界的清算。当然，研究和清算过去正是为了说明现在和认识将来，对国统区整个文艺界的清算是要在思想上为“文艺的新方向”作准备。正像《大众文艺丛刊》最后一辑在回忆创刊时所说的：“本刊创刊时候，正在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发表以后，当时我们感到历史已发展到了转折点，一个新的形势快将到来了，为了迎接这即将到来的新形势，觉得有必要特别强调文艺上为工农兵的基本方向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在新形势到来之前，这种思想上的准备，我们以为是必要的。”^③

邵荃麟认为，现有的国统区文艺并没有能真正表现在革命的新形势下翻身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国统区文艺作为思想斗争的一翼已经远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的传统已经转移到了解放区，而不是在国统区。“二十年来革命大众文艺传统，事实上不仅是在坚强地发展着，而且已经大大地跨进一步，和真正工农大众密切结合起来。这个主流却是在那人民已经翻身起来的广大区域里汹涌着，那个区域里文艺书籍的畅销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情况，是打破中国出版界与文艺界的记录的。只有在这个人民失去自由的区域里，文艺才呈现出上述的病态，而这

① 这六辑分别力《文艺的新方向》、《人民与文艺》、《论文艺统一战线》、《论批评》（此册亦以《鲁迅的道路》印行）、《论主观问题》、《新形势与文艺》。

②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见钱理群·《1948 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1998年版，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4年版，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新形势与文艺·编后》，载《大众文艺丛刊》1949年第6辑。